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我第三次做皇帝.....	爱新觉罗·溥仪(1)
南次郎与熙洽密谋建立伪满政权的经过.....	王德五(25)
吉长汉奸傀儡登场纪实.....	金名世(33)
我所知道的日满议定书附件的内容.....	阮振铎(45)
伪满日本官吏的秘密手册.....	王子衡(51)
日寇在伪满进行掠夺的三光政策.....	王子衡(56)
所谓“北边振兴计划”的内幕.....	谷次亨(75)
伪内蒙古自治军始末.....	正珠尔札布(84)
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记要.....	李泰荣(91)
内蒙德王和蒋介石的关系.....	陈绍武(104)
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	张炳如(126)
日本外务省就汪伪政权成立经过向内阁的报告	杨凡译(156)
汪伪巨奸派系之争.....	何国涛(163)

附注:

对《我第三次做皇帝》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一辑

对《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八辑

我第三次做皇帝^{*}

爱新觉罗·溥仪

“重登大宝”和初次访日

“……京津旧臣，闻皇上就任执政，疑尊号自此取消，同深悲愤。即曾任民国官吏如曹汝霖、汪荣宝等，亦以名义关系甚重为言。臣以皇上屡次坚拒，及最后不得已允许之苦心，详为解释，闻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终无以尽祛其疑。……”

这是我就任“执政”一月后，请假回津的陈曾寿寄来的“封奏”中的一段。来自京津的类似的封奏还有好几件，都曾引起过我的无限烦恼。

按照约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满，如果关东军不允许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不干的。胡嗣瑗和陈曾寿早在满期前两个月，就劝我催促关东军履行前约，他们认为关东军必不肯舍得我下台，因此是会接受帝制要求的。我没有照他们的办法去“将”关东军的“军”，我早已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且万一关东军让我辞职，我能到哪去呢？所以烦恼归烦恼，对关东军的顺从还是要顺从。

在将近我就职一周年的一天，在一次和武藏的例子会见中，出乎我的意料，他先向我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帝制的问题在日本还正研究着，意见尚未一致。据他看，到时机成熟时，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的。听了他的话，我自然就更不去想什么辞职不辞职的事

* 本文是作者所著《我的前半生》（未定稿）中第六章的几节。——编者

了。

比我还着急的人倒有的是。除了胡嗣瑗、陈曾寿之外，郑孝胥、熙洽等人也忘不了这件事。郑孝胥在1933年的重阳节写过一首诗道：“雪后重阳夕照明，高台纵目俯神京。平原已觉山川伏，投老翻教岁年轻。燕市再游非浪语，异乡久客独关情。西南豪杰休相厄，会遣遗民见后清”。他不仅要在满洲行帝制，还想回燕京，实现“后清”的幻想。熙洽不只是幻想，而且在我就职一周年时还有实际行动，他指使手下一名心腹叫林鹤皋的，借长春一个小学校的地方召集了一个五百多人的会议，到会的有满族“遗民”，也有前东三省国会议员，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请求实现帝制”的决议。这个会没开完，就叫日本宪兵给冲散了。但是关东军司令长官倒也没发脾气，却找了他去解释说帝制非不可为，不过是时机未至而已。

究竟时机什么时候来呢？我很想早一点知道。曾陪我到东北来的日本人工藤铁三郎，我的“侍卫处长”，这时他表示愿意为我到东京去刺探一下。我觉得这个日本人对我很好，我在旅顺时，有一次发现茶水变色，疑心有人下毒，叫人去化验一下，工藤拿起这杯茶，一仰脖喝了下去。这个举动使我相信他的忠心，于是赐改他的名字为工藤忠。现在他又提出这样主意，我自然十分高兴，就把这个刺探时机的任务委派了他；并嘱咐他从侧面去活动，千万不要说是我派的。他到东京去了一趟，找到了南次郎，他探得来的消息虽非十分理想，也还是乐观的。据他说日本军部方面大致上同意实行帝制，实行的日期也不会太远了。

究竟时机是指的什么呢，我始终也没弄明白。这年的3月2日，日军已完成了东北四省的全部占领；3月24日，国联通过一项“宣布日本为侵略者”的决议；27日，日本退出了国联，宣称再不受什么约束。5月31日，长城战役以塘沽协定宣告了结束，划定长城以南的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退了。在我看来，这些叫每个真正的中国人都不胜愤激的事件，都是做皇帝的时机，但一个一个的都过去了。一直到“时机”真地来临，继任的关东军司令菱刈

隆在这年年底突然告诉郑孝胥说，日本政府可以承认我做皇帝时，我也没弄清楚“时机”是个什么东西。我由于过分地高兴，也没有心思研究它了。

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准备一套清朝皇帝的龙袍。我把帝制的实现，是看做走向大清复辟的起点的。在日军发动长城战争时，我就幻想过由日军替我把“大清疆土社稷”全部恢复过来，送我到北京重登大宝。后来听说打到密云就停了战，心里很是不满意。这时我又想，我先把清朝皇帝的架子准备好，将来我必能走进我的紫禁城。谁知这套龙袍刚从北京敦庆隆买来（旧的全没带出来），就出了岔子。关东军派了人来告诉了郑孝胥，说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皇帝登极不能穿清朝衣服，要穿关东军指定的礼服，即陆海军大元帅服。

我这时又忘了日本人批准的皇帝身价，忘了日本人所以要实行帝制，不过为了好利用“皇帝”的名义更省事地统治这块殖民地而已。我的脑子只顾发热，就不知天高地厚地一定要郑孝胥给我向关东军去交涉，非得穿清朝服制不可。陈曾寿这时曾提醒我说：“皇上要争的不该是衣服，倒是应该把君主实权和关东军说好，如果有了实权在手，就是学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未尝不可。”可是在脑子发热的时候，清朝袍褂——我从小看惯穿惯的服制，就像童话里的法宝似的那么代表权威，好像有了它，什么实权、威风就会一齐来到我身上一样，因此别人的话我全听不进去。

结果，挨了关东军一个硬钉子。关东军坚决表示，登极典礼非穿指定的制服不可，这是没有什么商量的。最后，只允许在祭天的时候，穿一次清朝袍褂。我看实在没办法争了，才又有点清醒过来，明白了皇帝的称呼本是人家赏的，再争下去说不定连皇帝也当不成了，也只好答应下来。3月1日这天，在长春郊外一个叫杏花村的地方，在临时垒起的一个土坛（代替天坛）上，举行了告天而后即位的祭天古礼。我总算穿了一次龙袍，过了一次瘾。

举行过登极典礼（1934年3月1日）之后，日本天皇派来了他

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为代表，前来祝贺，并且给了我日本大勋位菊花颈饰和菊花大绶章，给了婉容（我的皇后）一个宝冠章。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日本人的这些举动，又让我飘飘然忘其所以。如果这是我的那种情绪的起点，那么到1935年4月，我到日本回拜天皇时，则是到了高涨的顶点，也是我的美梦最浓的时刻。在这个美梦里，我把自己看做是和日本的裕仁的兄弟辈，认为开始“时来运转”了。

其实这次访日，全是关东军安排出来的。他们说，为了答谢日本天皇派御弟秩父宫来对我“即位”的祝贺，也是为了对“日满亲善”的躬亲示范，需要这样办一办。

日本政府以枢密顾问官林权助男爵为首组织了十四人的接待委员会，派了战舰比叻号来迎接和白云、丛云、薄云等舰护航。我从大连港起舰时，又有球摩、第十二、第十五驱逐舰队接受我的检阅，到达横滨港时，又有百架飞机编队的欢迎。……记得我在这次晕头转向、受宠若惊的航程中，写下了一首谄媚的四言诗：

海平如镜， 万里远航。

两邦携手， 永固东方。

在航行的第四日，看了一次七十条舰艇的演习，又在晕船呕吐之中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

万里雄航破飞涛， 碧苍一色天地交，

此行岂仅览山水， 两国申盟日月昭。

总之，还未上岸，马屁先拍过去。因为我不仅对日本所示之威力深感惊异，我还把这看做是对我真心尊敬，真心帮助。过去的一些不愉快，只怪自己误会了。

到了日本东京，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为我设宴，然后又是向我住所回拜。我接见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他们的祝贺，同裕仁一起检阅了军队。我也跑到他的家庙“明治神宫”去参拜，给他爸爸“大正”上坟。我到日本陆军医院慰问那些侵略中国挨了打的伤兵伤官，又到裕仁的母亲那里，献献殷勤。日本报纸曾报道过我和她

散步的情形，说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宫内府中，搀我父亲上台阶是一样心情。其实，我还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问我搀扶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说，那纯粹是为了巴结。

离东京的那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在车站向我送别，他致欢送词说：“皇帝陛下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满亲善，是有重大贡献的。我国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这是我希望。”

我就又用了那种巴结的心情回答道：

“我对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国民的热诚欢迎，实是感激已极。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我对这件事，是抱有确实信心的。”

临登船出发时，我向担任接待的林权助又讲了一遍。临了，我请他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亲致谢，提到裕仁母亲，我居然两眼含满了眼泪。而且这样一弄，把那个老头子也给逗哭了。回想起来，一点中国人味也没有了。

总而言之，日本皇室这次对我的招待，使我头脑更加发热，感到自从当了皇帝之后，连空气都变了味。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逻辑，天皇与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满洲国的地位。日本人对我，当如对其天皇者同。

在这种飘飘然中，我回到长春，立即请来新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南次郎大将，向他发表了感想，次日（即4月29日）又到南的住宅，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裕仁的生日的庆祝会。再次日，我便急不可待地下谕，把在长春的所有简任职以上的官吏，不论中国人日本人全召来，听我训话，发表访日感想。我在事先完全没有和日本人商议，我也没预备讲话稿，人到齐了，我便讲开了。我讲了访日的经过，绘形绘声地描写了日本天皇对我的招待，讲了日本臣民对我的尊敬。最后我说：

“为了日满的亲善，我一定拼命去干。因此，我认为：如果日本

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也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在5月2日我还颁布了“回銮训民诏书”，那是由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远藤柳作授意，郑孝胥起草的。

朕自登极以来，亟思躬访日本皇室，修睦联欢，以伸积慕。今次东渡，宿愿克遂。日本皇室，恳切相待，备极优隆，其臣民热诚迎送，亦无不殚竭礼敬。衷怀铭刻，殊不能忘。深维我国建立，以达今兹，皆赖友邦之仗义尽力，以奠丕基。兹幸致诚悃，复加意观察，知其政本所立，在乎仁爱，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诚意为国，故能安内攘外，讲信恤邻，以维持万世一系之皇统。朕今躬接其上下，咸以至诚相结，气同道合，依赖不渝。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凡我臣民，务遵朕旨，以垂万祀。钦此！

关于这篇充满奴化毒素的伪诏书的出现，也曾有种种“非个中人不曾得知”的内幕。那就是我这次到日本，从东京游历了京都、奈良以后，到了须摩的“武库离宫”，准备回东北前，当时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远藤柳作对我说，在“回国”之后，应当发表一篇“诏书”来表示对日本的感谢，并要把这种精神传告于“全国人民”。（从这里更可以看出伪诏书的颁布，已早经日本关东军和政府军部内定。）当我回长春以后，果然郑孝胥便拟出了这一“诏书”的草稿给我看；同时专门操纵我的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也替我出主意，说道“在这‘诏书’里面，该当添上‘依赖不渝和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的字样”。于是我亲笔加上那几句话。吉冈说要写成“依存不渝”，后来因为郑孝胥说这话不通，结果将“存”改为“赖”。从此以后，伪满的司法和警察机关就有了治罪的一条，叫做“破坏依赖不渝”或“违反与友邦一心一德”。

我从这次对各伪大臣、参议讲话以后，再没有过这样的随便讲

话，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至太平洋侵略战争后，对我限制一天比一天严。关东军指定我会见的人，除了每周一次向我报告“国务”的总理大臣、参议府议长之外，其余的“大臣”们后来只有每年末规定的“政务”上奏（这时还有伪总理张景惠的侍立）和在伪宫举行的形式上的参议府审核年终预算会议以及逢年过节举行庆祝时见见面，再不能如以前的随便来见我。到了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限制的就更严，连我见亲属也受到限制。我的亲属除了在长春的妹妹、妹夫和留在“内廷”念书的侄子们之外，关内亲属只准关东军指定的几个人来看我。其他凡是从华北来的不论是亲属或常亲属都只能在年节与我生日时向我庆祝时行礼，不许个别谈话。这是由吉冈安直写在条子上交伪宫内府大臣熙洽照办的。另外“帝宫”里还住着几个日本宪兵，来往人是瞒不过他们的眼睛的。这几个宪兵穿着非日非满的特制的墨绿色制服，他们的屋门口有一个木牌，没头没脑地写着三个字：“宪兵室”。

最重要的，是一个过去有事才来、无事不来的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有了一个“帝室御用挂”的新官衔，成了每天有事无事必到的关东军代表，我的一切举动都必须在他的指导下进行。

吉冈安直的高压电线

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

这个高颧骨、小胡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儿岛人，从1932年起来到我身边，一直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苏联俘虏时止，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十来年间，他由一名陆军中佐，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起先，他的身份只有关东军高参，从1934年起又增添了一个“满洲国帝室御用挂”的官衔。这个官职是日本名称，据说意思好像是“内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书”，究竟应当译成什么名称合适，我始终也没有认真去查问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

它的字面含意无论是什么，都不会说明吉冈的实际职能的。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不过这职务一连干了十几年，也必须有他的本事。

有的书上说，吉冈是我在天津时的好友，后来他当了关东军参谋，正好这时关东军要选一名帝室与关东军之间的“联络人”，以代替解职的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认为他最合适，因此当选。事实上，我在天津时有一段时间，经常听他给我讲时事，谈不上什么好友，他被派到我这里当“联络人”，也不是先当了关东军参谋才恰逢其时的。如果说他是溥杰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真的。伪满成立以后，溥杰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吉冈正好在这学校当战史教官。几乎每个星期日，吉冈必将溥杰请到他家作客，殷勤招待，培养了“友情”。这样时间不久，溥杰就听吉冈透露出了，关东军有请他到我这里任职的意思。那时他曾表示，如果他不作为关东军的高级参谋而来到满洲，他就不想干，因为忠岛比多吉（任“执政府”的咨议）和石丸志都磨都由于没在关东军里扎下根，所以全没站住脚。

后来，他果然以关东军高参的身份来到我这里充当“联络人”来了。他在未上任之前，先请溥杰到他家去作客，请溥杰写信把这消息告诉我，并且说希望我能预先为他预备好一间办公的屋子。我接到溥杰的信，因为早知道他对溥杰的殷勤照顾，九一八事变前他叫溥杰透消息给我的事当然我更不会忘记，我觉得吉冈对我不坏，于是欣然照办，在他还没到长春之前，就给他把屋子预备好了。这件完全多余的举动，过了许久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他这是有意给关东军看的。他在关东军眼里既有和我的不平凡的关系，在我的眼里以及其他“日满官吏”眼里又有关东军高参这张老虎皮，自然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了。

吉冈很喜欢画几笔水墨画。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墨竹，请郑孝胥题了一首诗，又请我题了几个字（什么字，早已忘了），然后带到日本，送给了裕仁的母亲——日本皇太后。不久，这幅画在日本报纸上刊登了出来，并称誉吉冈为“采笔军人”。吉冈的艺术声名是否就

从这次出现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指望这幅画带给他的，并不是什么“采笔军人”的称号，却是比这称号更有价值的，位于日“满”皇室之间的身价。我从日本访问回来，日本皇太后和我经常不断互相馈赠些小礼物，自然，“联络人”就是这位吉冈。从那次他送了墨竹之后，东京与长春的往来就更繁了。

他大约每年都要往返东京几次，每次临走之前，总要叫我做点点心之类的食品，由他带去送给日本皇太后，回来时还带回日本皇太后的礼物，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日本点心。那位老太太和我都闲着没事，我们又都有现成的作点心的师傅，彼此送来送去也都不费什么事。不过由于我的疑心病，吉冈每次带回来的点心，我总是叫别人先吃，我才敢吃。

当然，吉冈每年一次往返于日“满”皇室之间，这决不是他的擅自专断，但每次往返的内容，我相信主要是由于他的独创设计。比如有一次，他看见了我的四用联合收音机，忽然像发现了奇迹似的问我：

“这个机器也能 Record(录音)？”

他的中国话不大好，但我们交谈起来还不困难，因为他还会点英文，程度和我也差不多，我们平时就在中国话里夹着英文，同时又用笔谈帮忙，倒也能把意思说清楚。

“Record 是太大的好”，我说，并且拿出一片录音片试给他看。

“好，好！”他高兴地笑着，看我安好片子，便说，“我教陛下几句日本话说说吧！嗯！——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

我照他说的日本音说一遍，“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这句话录到唱片了。他把那唱片放送了两遍，满意地拿了起来。

“好，这次我到东京，嗯！把它贡给天皇陛下！”

吉冈说话，总带几个“嗯！哈！”眼眉同时一挑一挑的。这个毛病，越到后来越多，我觉得越不受用。和这种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他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解释。

1934 年我访问日本，日本皇太后给我写了几首和歌，那时吉

冈的话是我最顺耳的时候。

“皇太后陛下等于陛下的母亲，我如同陛下的准家属，也感到荣耀！”

他那时对溥杰说：“我和你有如手足的关系。我和皇帝陛下，虽说不能以手足论，也算是手指与足指关系。咱们是准家族呀！”

但是到1936年前后，他的话有了变化。这时他每天必到，我接见外国人时有他在旁“侍立”，他认为我该对什么人讲些什么话，也由他预先在纸条上写好。每年一次“军管区司令”会议或“省长”会议的宴会上，那是必定要叫我讲一次话，以示“鼓励”的。在他写好的台词上，免不了的是这类“协和语”：“努力日满亲善，作皇军的一翼”，“一心一德，达成大东亚圣战”，“断乎支援亲邦圣战”等等。我可以见什么人、不可以见什么人，都由他决定。关于我祭祀祖先的事，关于各处陵寝的管理，田庄收人的处理，北京家族谁能来看我，他一概都要管。起先，我还能看到外面寄来的信，帝制以后，一封也没有了。他这时最常说的话就是：

“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嗯；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嗯！父亲的意思是要听的！哈！”

日本军队前线景况越坏，我的辈分也越低，后来他竟是这样说的：

“关东军是你的父辈，我是关东军的代表，我是拿你当作自己的兄弟看待的！嗯！”

有的书上说，吉冈和我的关系极亲密，这话也许是根据我对他的言听计从，向来不敢违犯一句说的。这也是实情，原因就是我怕关东军怀疑我，而关东军是靠吉冈来了解我的。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对我的监视特别加紧，如限制关内亲戚来长春，检扣我的信件，等等，原因是防止我和北京天津的王公旧臣们连结起来，共谋在关内复辟，这是不符合他们分而治之的方针的。其实，这时我已经不敢存这个幻想了。

吉冈后来每天进“宫”极为频繁，也没什么非谈不可的事必

须见我。有时来了不过十分钟就走了，走了不到五分钟又来了。去而复返的理由都是很不成道理的，比如刚才忘了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忘了问我明天有什么事叫他办，等等。因此我不能不疑心，他是成心想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来查看我在干什么的。

我应付他的办法，就是一听说他到，我立即接见，尽力减少他等候的时间，免他起疑心。甚至他来时正赶上我在吃饭，我也立刻放下饭碗去见他。对于他，我算做到了“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程度。

后来，我每次和他见过面之后，总是提心吊胆，不知其用意何在。因此当他一走，我必拿出铜钱来算一次卦，算算这次见面给我带来的是吉是凶。

我的恐惧

经过十四年奴隶生活的东北人民，家家都有一本血泪账，都在我裁可的镇压人民的伪满法令下，遭受到程度不同的牺牲。起初，日本人根据这些法令所制造出的惨案，我还听不到，因为郑孝胥、张景惠向来对我不谈这些，关东军司令和我的御用桂吉冈安直更绝口不提。我从他们嘴里听到的和“满洲国通信社”的新闻一样，都是“王道乐土”的描写，或者“扫荡胡匪的赫赫成果”的报道。一直到1936年，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日本关东军不但再瞒我，而且有时还故意要叫我了解一下。凌升案就是一个例子。

凌升是蒙古的贵族，前清蒙古都统贵福的儿子，他做过张作霖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古宣抚使的顾问，是第一批投靠日本关东军的“满洲建国元勋”之一。伪满划东北为十四省时，他是第一任的兴安省省长。这年他刚和我结成亲家（我的四妹和他的儿子订婚）。不久，我忽然听说他被关东军捉了去。是什么原因，是死是活全不知道。我正感到十分不安，盘算着是不是可以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打听一下，植田却先找我来。他像谈论天气似的那么平

常地对我说：“前两天关东军特务机关处理了一个案子，这个人，皇帝陛下大概记得，是凌升。他勾结外蒙（指蒙古人民共和国）图谋叛变，关东军已经将他正法了。”

“已经正……法？”我吓了一跳，疑惑我耳朵听错了。他的翻译官连忙重复一遍：“正法，不错，杀了。”植田也狞笑一下，点头说：“这是杀一儆百，陛下，应该杀一儆百！”

我吓得目瞪口呆。植田走了之后，我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吉冈的意思，告诉人赶快把说好的这门亲事退了。

一连许多天，植田的“杀一儆百”在我耳边响着，我不住地揣摩它的含义。我早听人说过，日本关东军是最多疑的，总在疑心“满洲官员”是不是在反对它。而我也是个多疑的，总在疑心关东军不放心我。我不由得回忆起到东北后的一连串经历，从逛公园被宪兵包围起，一直到最近不准许我接见“大臣”，我肯定这都是关东军对我提防的表示。因此，我越想越觉着植田的“杀一儆百”这句话不妙。我怕他说这话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后来，给我当过英文翻译的吴沆业失踪了。听说他被调到驻东京的伪满使馆后，因为和美国使馆有来往，被日本宪兵逮捕。再后听溥杰说，这个翻译曾托监狱的看守带信出来给他，说他受的折磨实在忍不住了，求溥杰找我想办法救他，如果救不了，索性让他早点死，免得继续受罪。溥杰没有答应，因为他明白，如果他真的向我转达了，不但无效反而会挨我一顿骂的。

有一天，我的“警卫处长”佟济煦愁眉苦脸地告诉我，日本人正在哈尔滨附近建筑一个秘密工程，在将近结束时，将劳工全部秘密消灭，以图保密。他有个亲戚也是劳工之一，万幸地逃了出来。这件工程据我后来在战犯管理所和别人一起判断，大概就是平房区的日本细菌部队。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这个惨绝人寰的魔鬼事业，但成批消灭劳工也足够骇人听闻的了。可是我听了这个消息，唯一的反应就是嘱咐佟济煦千万不要和别人说。

然而我越怕牵累，事情却又像故意找到我头上来。有一天佟济

煦心神不宁的和我说：“咱们的护军，好像很遭关东军的忌。”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精神恍惚地说：“没发生什么事，可是我总觉着要有事情发生似的。”

佟济煦的担心，我是明白的。所谓护军，即在宫内担任警卫任务的军队，这不同于“军政部”统辖的宫内“翊卫军”，是由我自己直接供应和组织的一支三百人的部队。当初我建立这支部队原来有个用意，我想用它培养出一批军队骨干，以便将来建立自己的武装实力。为了这个目的，熙洽给我从旧东北军中调拨了一些兵士，我又叫人从京津、内蒙一带招募了一批青年，这样编成了这支部队，名义上都是士兵，实际是按照军官的要求加以训练。这支队伍成立后，“军政部”不肯发供给，连枪支也不给，我从自己的收入中分出一部分供应它，并且枪支弹药也是自己派人买来的，因此就遭到了关东军的忌讳。以前，我并不怎么注意到这件事，可是现在发生了“杀一儆百”的凌升案，加上佟济煦这一说，我全想起了，也担起心来了。我还没想好处理办法，事情也就发生了。

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日里。护军里几个士兵到大同公园游玩，因为管理游艇的朝鲜人不肯卖票给他们，发生了口角。这时突然从四周来了一群便衣的日本人还带着狼犬，向他们动起手来。护军这次却也给逼急了，便使出了他们平时学的武术，居然打退了日本人的围攻，而且连狼犬也给踢死了。护军回队后，日本宪兵队立即用大卡车把他们抓走，施以酷刑，赤体鞭打，灌凉水 and 辣椒水，打了之后又叫他们赤体跳舞，以为取乐，并且逼他们承认“反满抗日”。原来被护军打伤的日本人，里面还有穿便衣的关东军官佐，踢死的狼犬是关东军的军犬。这显然是关东军的一场预谋。当时我一听这情形又气又怕，忙托吉冈代向关东军说情，后来按照对方提出的条件，派了管理护军的警卫处长佟济煦去赔礼道歉，将肇事的护军逐出东北，保证了今后永不发生此类事件。这些条件一一照办后，护军又被缩减了编制，缴去了长武器，一律换上手枪；同时佟济煦被革职，警卫处处长换上了个日本人。自然，我的建立实力的梦也不

用再作了。

应该提一下的是，我为了建设未来的军队，同时还送过一批青年到日本学陆军，其中包括在学习院（日本贵族子弟肄业的高级中学）毕业的溥杰和润麒。可是这批青年学成回来之后，除了溥杰和润麒之外，我也无权支配，都在“军政部”的分配下，“化”到日本人指挥下的“国军”和军事机关里去了。

还有，1936年，日本人在内蒙扶持起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即被称为德王的，成立“自治政府”。德王我早在天津见过，他曾送过我钱，送给过溥杰名种马。有一天，他得到关东军的允许来见我，当时吉冈还没有“侍立”，所以只有我们两个在屋里谈话。谈着谈着，他发起牢骚来了，说日本人在他那里很跋扈，他样样都作不了主，不听日本人的不行。他的话触痛了我的伤口，我对他表示了同情，安慰了他几句。不料第二天，吉冈便来板着脸问我：

“陛下昨天和德王谈了些什么？”

我觉得有些不妙，就推说不过是闲聊而已。

他不放松我，追问道：“昨天的谈话，对日本人表示了不满了吗？”

我心里砰砰跳了起来，我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决不承认，而更好的办法则是以进为退，我便说：“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编排出什么假话来了吧？”

吉冈虽然再没穷追下去，我却被他问得心惊肉跳，疑虑丛生。我考虑这件事只有两个可能，或者是吉冈在我屋里安上了什么偷听的机器，不然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真的说出了真话。我为了解开这个疑团，费了好大功夫在屋里寻找那个可能的机器，自然我没有找出它来，因此我又怀疑是德王成心出卖我，可是也没有什么根据。这两种可能都不能断定，也都成了我的新的魔障。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院里打打网球。我走到院子里，忽然看到迎门墙上有一行粉笔写的字：

“日本人的气，还没受够吗？”